

公众不应挥霍 “免费午餐”背后的善意

张山是郑州某生态农业园的负责人,他在黄河滩地上种了100多亩红薯却大部分没卖出去。由于担心下霜后红薯会烂在地里,他免费让市民去挖。他希望大家在挖红薯时,能顺带采购一些白菜、萝卜,然而,20万斤红薯1个小时就被挖光,但萝卜、白菜一天也没卖多少。(11月26日《河南商报》)

“免费午餐”的关键不在“午餐”,而在“免费”。在这样一个什么都要钱,什么都涨价的时代,“免费午餐”显得尤为难得,因此每当有这样的机会出现,必然引得人们趋之若鹜,生怕错过良机。

客观而言,如果是政府提供的一些产品和服务,在国家经济实力增强,或者是政府体恤百姓的情况下而对公众免费供应,比如“免费教育”“免费医疗”等等,这样的免费,应该是多多益善的。作为公众,也完全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国民福利”,当做是在享受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红利”,大可心安理得,而不用感到难为情。

但另一方面,对于一些人提供的“免费午餐”,尤其是当事人在被迫无奈的情况下“不得不”提供的“免费午餐”,我们还是应该多些谨慎,多些理性,而不能一哄而上,不分青红皂白地大快朵颐。像发生在郑州的这起市民免费挖红薯事件,其中反映出的公众心态,就颇为值得玩味。

作为这家生态农业园,之所以要推出免费挖红薯,并不是挣钱太多了,想回馈社会,而是在大部分红薯都没有卖完,眼看着就要烂在地里的情况下,才不得不允许市民免费来挖的。而且,主人还有一个打算,就是希望市民来免费挖红薯的时候,能够顺带着采购一些白菜、萝卜回去,帮助自己的生态园渡过难关。

可是市民又是怎么做的呢?20多万斤红薯,在一个小时内就挖得精光,而对于需要收钱的白菜萝卜,却几乎无人问津。虽然免费是主人允许的,但是作为市民,这么做是否有失厚道,有失仁义呢?或者说,在自己享受到了“免费午餐”的同时,是否想过也尽一份绵薄之力,购买一些萝卜白菜,以减少主人的损失,帮助主人渡过难关呢?

与其让红薯烂在地里,还不如让市民免费来挖,这是生态园经营者的一种朴素想法,其中必然会承受着一些经济上的损失。但是站在市民的角度,是否也应该秉持一种朴素的善意,尽量帮助对方降低损失?当有些人开着三轮车、拖拉机,一挖就是一车的时候,这已经不是享受“免费午餐”,而更像是一种趁火打劫,其背后所暴露出的贪便宜、钻空子、不劳而获的心理,让人唏嘘感叹。

说到底,对于别人提供的“免费午餐”,我们应该理性看待,不能只把眼睛瞅着“免费”二字,而无视别人的损失、别人的困难,而应该怀着一种感恩感激的态度和互惠互利的原则,在享受免费的同时,也让别人有所获,有所得,有所益。 苑广阔

“明星教授”亦需一点娱乐素养

近些年,在中国大陆悄无声息兴起了一批新新人类,笔者称之为“明星教授”,包括各种专家学者。“明星教授”以活跃在各种媒体,尤其电视讲坛为主,他们大都具有某方面一定的专业水平,更由于具有一定的传播素养并在媒体、书商等的包装下迅速成名。

既然“明星教授”是靠知识加电视包装,也就是娱乐化的包装而走红的,那么无论你愿意或不愿意,高兴不高兴,都必须承认自己不是真正的教授,而是“明星教授”,因而也就必须具备一定的娱乐素养。什么是娱乐素养呢?娱乐素养就是指在快乐的状态下自己消遣别人和让别人消遣自己的修养,通俗的话就是你既然靠电视等媒体包装出名,就不要装成严肃高深的样子。你要允许公众对你评头品足、说三道六,甚至强烈的批评等等。换句话说,你既然享受到了明星般的待遇,你就得付出明星般的心理承受力。

不幸的是,很多“明星教授”正如很多征婚节目主持人和男女嘉宾不愿承认自己在娱人娱己一样,他们只愿去享受明星般的光环和待遇,却缺乏必要的娱乐素养和心理承受力,岂不贻笑大方?

从北京某明星教授被某著名大学学生轰下台,到更早些的某更著名学者被公众挑出毛病后的愤然反击,都可看出这批“明星教授”娱乐素养的缺乏。还比如,某明星学者其经历、学术水平和为人不断遭到公众质疑后,该学者不断否认,甚至通过说谎来掩盖自己。明明靠包装出名,却又装作正经学者,何必呢?这些明星学者靠包装出名却又容不得公众的挑剔,真有点忘本或数典忘祖的感觉。这,我不愿说其学风上有问题,宁愿说是典型的缺乏娱乐素养的表现。

有评论说,“明星教授”从学术的“冷板凳”中解脱出来,进入大众传媒这一热门行当,“将大学讲堂搬到荧屏上”,以通俗的语言进行经验型知识的传授,缩短了“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之间的距离。只不过,当学术遭遇收视率,当愚念制造成惯用伎俩,当背后的利益链条若隐若现,“电视学术明星”也不可避免地遭遇老百姓的“口水”——常识错误也好,语出惊人也罢,商业化和娱乐化成为两根最大的“软肋”。我认为,这个软肋就是“明星教授”们靠包装出了名以后,就真把自己当成大学者、大专家、大教授了,而忽略了帮助他们成名的最根本因素——“娱乐”二字,再往高了点说,就是缺乏娱乐素养。须知,“明星教授”绝对不等于真的大学者、大专家、大教授。真正的大学者、大专家、大教授,往往会拒绝成为明星。

还必须指出的是,大多“明星教授”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几乎全然不关心现实社会和火热的社会生活,广大公众的诉求似乎与他们无关。比如,前几天发生的贵州5少年在垃圾箱里闷死,我注意到很少有“明星教授”发言。他们或迷恋于风花雪月、吟诗诵词;或鼓吹一些食而不化、千百年来被证明永远正确的一条又一条的真理。这次,某教授在某大学被轰下去,网上有许多评论,我最看好的是这条:某教授“这些年以娱乐明星的包装,制作起来的心灵鸡汤脱离社会现实,无视民众疾苦,矫揉造作……”这位网友的评价可谓深刻,值得所有明星教授们反思。的确,明星教授们挣的钱可谓多矣,崇拜的人也不少矣,各种头衔和职务也混了不少。缺什么呢?恐怕就缺点对社会生活的介入、对普通百姓诉求的真心帮助。

娱乐无错,更无罪,只要不是娱乐至死,但关键是要承认,不必羞羞答答,更不必装。其实,婚恋节目、电视文艺、超男超女以及“明星教授”们都是娱乐,逗你玩儿。 王旭明

“银行延迟两小时下班”值得尝试

日前,银监会主席助理阎庆民建言,提升服务水平是提升银行业竞争力的途径之一,银行对私时间应延长一两个小时,民众可在下班后到银行处理个人金融业务。此建言一出,立刻引来好评。

最近几年来,银行业能够引起公众普遍关注的话题,多以负面新闻为主,比如收费项目太多,收费标准太高。这些新闻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银行的社会形象,降低了公众对银行的信任感。

但是这一次,阎庆民关于银行对私时间延长一两个小时的建议,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如果能够真正得到落实和推行,必将在赢得公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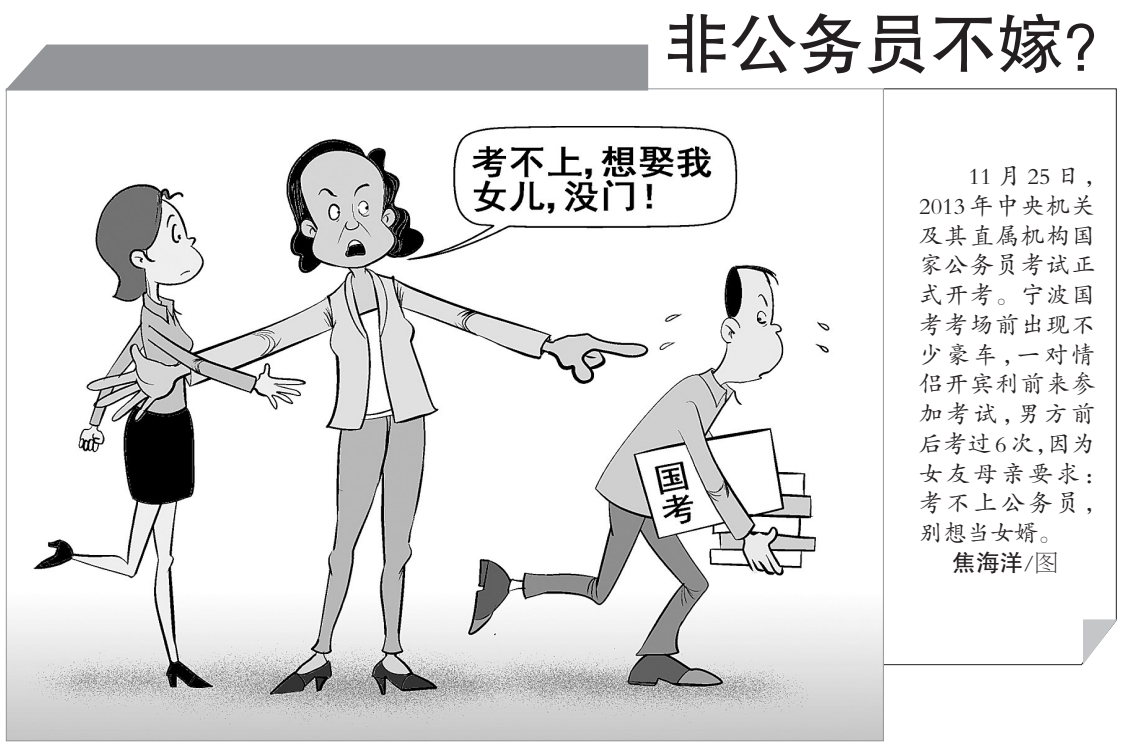
肯定的同时,重塑银行的社会形象。一说到在银行办理业务时的排队问题,很多客户都摇头,为此一些客户还和银行发生纠纷和冲突。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银行开设的业务窗口太少,服务人员

不足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某些特定的时间段,办理业务的客户太多,但银行工作人员却不增不减,结果就导致排队时间过长的现象。

比如中午这个时间段,银行的工作人员要休息吃饭,会相应减少窗口服务人员,但是也就在这个时候,很多上班族没时间空出办理业务,上班族,会前来办理业务,这样自

然会导致排队时间增加,客户满意度降低。而如果能够在下午下班之前延长一到两个小时的对私营业时间,必然能够满足相当一部分上班族客户办理业务的需要。

与此同时,因为在下午5点钟的时候,企业等单位都已经准备下班,银行的对公业务可以提前停止办理,这样也可以减少服务人员、降低运营成本。另一方面,对于那些退休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则可以选择在正常的上班时间来办理业务。如此一来,必将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客户“井喷”。因此,对于这一建议,各大银行应该予以认真考虑,尽早将其付诸实践。 苑广阔



非公务员不嫁?

11月25日,2013年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国家公务员考试正式开考。宁波国考考场前出现不少豪车,一对情侣开宾利前来参加考试,男方前后加考过6次,因为女友母亲要求:考不上公务员,别想当女婿。 焦海洋/图

“处长辞官从教”的看点在哪?

山东临沂大学完成了新一轮专业技术岗位全员竞聘,包括教务处长、科研处长等8位具有正高级职称的在任处长纷纷“辞官从教”,当起了教授。(11月26日《齐鲁晚报》) 据报道,临沂大学此番人才的“怪异”流动,源于学校新出台的一项人才政策。临沂大学为“把高层次、高职称、高学历人才向教学和科

研一线引导”,大幅提高了教授的津贴待遇。教授按照级别,其岗位津贴每月要比“处长”多出从20%到数倍甚至数十倍之多。

这些年,高校的行政化、衙门化之所以积痼难除,主要是因为“官本位”观念侵蚀象牙塔,出现了按官位大小分配科技资源和荣誉的乱象。临沂大学的此次改革,事

实上是教育回归教研、回归常识的一种有益探索。虽然,本次改革才刚刚开始,效果尚有待观察。但值得肯定和具有借鉴意义的是,高校只要肯下决心改变价值导向和利益分配制度,让教授的地位得到尊重和凸显,人才自然会流向教研“高地”,高校的行政化、衙门化也就不再是一块坚冰。 刘道彩

“猎头选官”合法吗?

据报道,苏州市委组织部多次通过猎头公司选拔市管领导干部,陆续采用这种方式选拔干部共21名,分布在城建、规划、财政、金融等多个部门,最高职位为副处级。

苏州市突破身份界限,通过猎头公司选拔领导干部,引起争议。一方面,大部分公众肯定了其积极意义,认为这种选人机制可以实现双赢。另一方面,也有人对此提出了是否合法的质疑,正如某专家所担忧的,“这违反了公务员凡进必考的原则,违反公务员法,打乱了公务员的晋升机制。”

其实,《公务员法》本就有着“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制度设计,规定着:“厅局级正职以下领导职务或者副调研员以上及其他相当

职务层次的非领导职务出现空缺,可以面向社会公开选拔,产生任职人选。”因此,通过猎头公司选拔领导干部是否合法,关键在于是否面向社会公开选拔,是否对拟录用人员进行了严格的考核。

从报道中可以看到,在选拔之前,当地主流媒体以及网络都刊登过相关招聘信息,对外公开全国招聘。另外,当地政府并不是将选拔工作一股脑交给猎头公司撒手不管,而是由猎头公司筛选出初步人选,再参加组织部统一组织的相关测试,候选人只有通过测试和组织考察后,才能成为最终人选。最后,这些人选还需要经过2-3年的聘用期,只有在双方考核认定彼此符合后,

才将他们纳入到体制之内。综观整个选拔程序,既存在合法性,更具相对科学性。然而,作为一种尚未成熟的尝试,仍有需要完善之处。

猎头公司作为商业主体,如果具备了较为充分的选人权,可能更会出现选人唯亲等非正常行为。因此,不宜让猎头公司冲在前线主动提供候选人名单并主动联系候选人。猎头公司更应隐蔽性,成为一只“看不见的手”,即使在人才库有合适人选,也应提交给用人单位,由单位与人才进行沟通。由单位提供最初人选,猎头公司根据专业知识筛选出初步人选。如此就更能够实现选人和决策者的分离、制约,避免非正常行为的发生。 舒锐

能否为“失独家庭”建立保障机制

近日,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政府为解决该区独生子女死亡、伤残家庭的实际困难,拟定由政府给予每人每月600元到750元不等的“特别资金扶助”。

“失独家庭”每月可获最高1500元的补贴,这样的标准不低。要知道,目前国内大多数地方,对于“失独家庭”的补贴,多在每月几百元,例如,石家庄规定,“失独家庭”女方年满49周岁或男方年满55周岁后,每人每年可获得1800元生活补贴。福田区对于“失独家庭”的扶助与关怀,为其他地方树立了标杆。

但是,福田区的标准之“高”,也只是相对而言。此前民政部曾表示,“失独”老人可比照“三无”老人(即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法定赡养人和抚养人),由政府供养。而目前各地对于“三无”老人的供养,标准一般都不低于上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40%,例如在江苏常州,每个“三无”老人的供养标准已达到了每月1000元。2011年深圳人均可支配收入是36505元,如果乘以40%,每对失独夫妻可以领到每月2400元左右。

可见,比照“三无”老人,福田区的“失独家庭”的补贴标准,其实并未“达标”,更不要说其他地方的补贴更少。这样的尴尬,正是源于“比照执行”的制度。所谓“比照”,意味着各个地方政府在执行时有很大的自由裁量度,补贴的标准高低,取决于地方的财力,取决于地方政府对于“失独家庭”问题的重视程度。

“失独家庭”保障比照“三无”老人执行,其实是个权宜之计。“失独家庭”,是个很特殊的社会问题,也是中国独有的问题,简单比照或套用其他人群的保障制度,必然会出现各种制度的不协调,难以做到应保尽保,我们亟须针对“失独家庭”的特殊情况,建立专门的保障机制。

例如,现在人们多关注失独夫妻的养老问题,现实中,失独夫妻若不进入老年,是无法领取政府补贴的。但是无法再生育的中年失独夫妻,为何不能领到补贴?应当看到,每一对失独夫妻都为国家的人口政策付出了巨大牺牲,国家理应担起责任,把失独夫妻都纳入帮扶范畴。因此,对于失独夫妻的抚恤、保障、救助政策,应当覆盖所有年龄段,不能有所遗漏。

另外,养老、医疗等物质保障,固然是“失独家庭”担心的,但他们更大的恐惧在于精神支柱的坍塌。失去了子女,许多夫妻的精神遭遇重创,他们迫切需要精神上的抚恤。所以,由国家出资,针对“失独家庭”,建立起心理治疗机构、社区、政府等多方共同参与的精神救济机制,是“失独家庭”与其他群体保障制度的一大不同之处。

中国“失独家庭”已达百万之众,但对于这个悲剧性的群体,制度的关怀还很不到位。如何在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三个方面,构筑起“失独家庭”的特殊保障机制,帮他们走出人生的阴霾,感受到国家和社会的温暖,这个问题当提上解决日程。 京文

粮食不如矿泉水值钱的后果

最近农业部经营司副司长黄延信在一次大会上表示:粮食不如矿泉水值钱,这不公平,也不合理。他建议国家应逐年提高粮食的最低收购价格。

我赞成黄先生的观点及判断。近年来我国在农资价格、土地价格、外工打工价格等都飙升的情况下,唯有粮食价格上涨幅度缓慢,导致最重要的农产品——粮食,成为最不值钱的东西。粮食不如矿泉水值钱会带来什么后果?

其一是农民不愿种粮。如果除去劳动力的费用,现在种麦基本上没什么利润,长此以往,对粮食安全会影响很大。

其二是粮食浪费严重。由于粮食太便宜了,目前我国各地粮食浪费现象严重。

其三是农民收入难以提高。目前农民收入的一半来自于种地,如果种粮获得的收入太低,就会影响到我国农民收入的整体提高。

为什么粮食最重要却最不值钱?原因很简单,是国家统一定价的祸。粮食价格波动对消费者不利,为了确保CPI,保证消费者的利益,我国建立了庞大的粮食收储制度。一方面通过国家统一粮食定价,这个价格一般增长速度与农资、农民工资、经济作物的增长速度要低出不少,另外通过收储与抛储来调节市场的粮食价格波动。这样一个价格调节机制,基本上粮食涨价的空间很少。

我国目前的粮价究竟高不高?有人认为与国际粮价相比我国粮价已不低。我认为这种比法是错误的,因为参照标准错了。目前国际粮价主要由美、加、澳来供应,他们农民人均耕地非常多,而我国农民人均耕地太少。我国应与同属小农的日韩来比。日本的稻米价格是我国的10倍至20倍,而韩国是我国的5倍至15倍。日本不但实行稻米的高价,而且还实行高的农民收入支持计划,使得工农业收入差距并不大,韩国同样如此。

粮食是我国居民最重要的主食,但在目前的所有农产品中却是最不赚钱的。它的价值在价格中没有反映出来,说明目前我国的粮食定价机制有问题。

当然如果担心粮价上涨会影响通胀,可以建立相应的农民收入支持机制,加大对种粮农民的补贴。这样就可以让粮价处于一个正常的运作状态之中。 郑风田

扭奢侈浪费风须改变不良社会生态

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家里没有电视,我们几个孩子只好厚着脸皮跑到邻居家去看8英寸的黑白电视。后来自家有了黑白电视,但看不到彩色,便与许多家庭一样,弄了个彩屏放在电视机前。那时母亲说,要有一台彩电我这辈子就心满意足了什么都不重要了。后来彩电托关系弄到个“大件指标”,家里有了台进口彩电。再后来,又添置了进口的电冰箱、洗衣机、空调、音响……近些年,家里的彩电换了液晶的(且由全家一台变成每个房间都有),小房子换成了大房子,自行车换成了小轿车,国内游变成了境外游……如今,母亲当年说的话已成家人的笑柄,每当我们说“您不是说有台彩电就什么都不要了吗”时,母亲总是笑而不语。

的确,如今的好日子,穷惯了的人当年想都不敢想。但是,穷怕了的人富足后的铺张浪费程度、欲望的膨胀程度也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当今的社

会环境,更多的是在诱导、刺激、放纵而不是遏制人们不断膨胀的欲望与奢求,尤其是对金钱、物质的欲望与奢求。官场上,奢侈浪费之风、贪腐之风越刮越猛,用公款或他人的私款抽名烟、戴名表、用名笔、拎名包、开高档车、穿高档服装、用高档办公用品、吃豪华宴、建豪华办公楼、游风景名胜、收藏珍稀文物;社会上,物欲横流,拜金主义盛行,贫富不笑,争面子,讲排场,竞奢华,好攀比,人情债无处不在,铺张浪费随处可见;商场上,“极品”、“奢华”、“尊贵”、“皇家”等字眼充斥于广告推销中;家庭中,父母对于子女宠爱有加,有求必应,子女对父母索取无度,安然啃老,有读者来信说“我爸有的是钱,我不花谁花”,“我们辛辛苦苦这么多年,挣钱不就是

给孩子花的嘛”并非少数人的理念……诸如此类的社会病无时无刻不在侵蚀着社会肌体,浪费着社会资源,损毁着人们的生存发展环境。

动物如果需要某样东西,它知道自己需要的程度和数量,人类则不然。得一望十,得十望百,得陇望蜀,欲壑难填,这是人的本性,也是人的可怕之处。有言道:“欲生于无度,邪生于无禁。”生之有时而用之无度,则物必虚。人类历史上不乏因奢而亡的例证,古罗马帝国的消亡很大程度上源于自上而下的骄奢淫逸、挥霍无度。

一个健全的社会,是给人的生存与发展提供充分空间及有力保障的社会,也是有效管理人的欲望的社会,尤其是对官员欲望的管理。“上梁不正下梁歪”,官风对

民风的影响力尽人皆知。所以,理应将反奢侈浪费作为反奢侈浪费的前提。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与细化必不可少。因为,当今中国的铺张浪费之风盛行,与许多消费并非自己的劳动所得有很大关系。

此外,如何引导国民确立健康文明的生活理念、生活态度、生活方式,如何为人们提供更多的精神食粮、满足人们的文化需求,如何将人们对物质的狂热追求引导到对文化、文明的追求上来,如何把握好发展经济、刺激消费与适度消费的关系,都是需要我们认真研讨的课题,国外的一些有益经验值得好好借鉴。

只有建立良好的社会生态,创造以勤俭节约、不劳而获、铺张浪费为耻的社会环境,无论是公家还是民间的铺张浪费之风才有可能得到遏制、扭转。 赵蓓蓓